

# 基于“学术根据地”的三元谱系

——评《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

◎ 陈璧君

**摘要：**由历史小说研究、文学史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组成的学术选集《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映照了吴秀明学术研究的三个阶段，也即基于“学术根据地”三元谱系。“学术根据地”的建立、超越和再超越，及如何维持建立与超越中的动态平衡，除受制于学者的学术个性与知识学养外，并无恒定的模式。文学与历史是支撑吴秀明“学术根据地”的基点，它们彼此互动关联，对当代文学“历史化”及其学术研究的潜心涵泳，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学术根据地” 研究向度 动态平衡 知识学养

“学术根据地”意识始终贯穿于吴秀明的学术自选集《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小说研究回归到学术工作——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再到近些年深入拓展的文献史料研究，一次“回归”，一次“深入”，构成了“学术根据地”建立后的超越与再超越，由点及面地铺就了一张独特的当代文学研究“三元”学术谱系。

在收入这部自选集的文章中，吴秀明不止一次赋予学术探索的“阿基米德点”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在《探寻立体呈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体系与方式——〈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的编纂理念与学术追求》中，他将“文本细读”与“史料实证”视作“自身赖以支撑的阿基米德点”<sup>①</sup>。同样，在研究茅盾历史文学理论的文章《论茅盾对现当代历史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中，吴秀明也以理论批评的眼光审视茅盾的理论建设历程，指出茅盾理论体系的四个板块，“‘真实论’是支撑其整体构架的阿基米德点”。<sup>②</sup>由此可见，无论是开辟自身的学术研究道路，还是评论当代其他学者、作家的著述，吴秀明始终给予了一种“根据地”意识的聚焦，即重视学术上的钻研性、深入性和逻辑性，找准其“阿基米德点”做研究，在这些特定的领域中谋求“共振”，互动互渗，达到学科间、研究方向间的共通和融合，并维持研究过程的动态平衡，即“学术根据地”的建设。

《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是作者从近 300 篇发表文章中整理编排的，上、中、下三编的排列颇有点儿回顾自身学术生涯的意味，“以后视前”的言说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其学术旨归：历史虽描绘过去，却也指向当下和未来。作者对作品与史料、文学史、历史文学这三个向度的研究，对应着“学术根据地”建设从后到前的三个阶段。而这三个向度的确立，无论是自选集的编排还是所收入研究论文的具体内容，都散发着浓郁的个人兴味。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根据地”意识是贯穿于吴秀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自觉，它的建设也充分取决于学者本人的学术个性、研究兴趣，受制于其知识结构和学养。梳理历史小

说研究、文学史研究、文献史料研究的三个阶段、三个向度,读者或许从中可感知动态平衡的“学术根据地”是如何落成,又如何以研究者的学术前瞻性充实并打开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多维空间。

以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下编“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收录了作者1982—2009年间的12篇历史文学评论文章。吴秀明在“后记”中说明了文章的编选是“合历史合目的”的,因此除了1982年初出茅庐的作品《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外,其余都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20多年。选文针对八九十年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及演变作出梳理和批评,对历史小说的叙事维度、主题及模式都有专论,如历史小说的明清叙事、反法西斯主题的抗战文学、领袖传记文学和“故事新编”模式;同时兼顾时下的文化转型语境,就“文学真实”问题做了深刻的剖析。此外,自选集收录的《论茅盾对现当代历史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等文章还具有深厚的理性思辨能力,结合中西方的理论成果,将茅盾的历史观、真实观、艺术观条分缕析,其“以史观文”的思维脉络奠定了广阔的文学史视野。“我是根据写评文的需要,有目的地去翻看史书。比如在写到唐玄宗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有关唐玄宗这方面的史料,在写到捻军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有关捻军这方面的史料。”<sup>③</sup>吴秀明自述历史小说研究是自己建立的第一个“学术根据地”,而犀利的批判眼光和夯实的历史知识基础缺一不可,是一位优秀历史文学批评家必备的学术资质,也是抱有深沉学术热情的学人才能一以贯之的。

中编“文学历史的编写与反思”收录了发表于2003—2017年间的12篇文章,就文学史编写的时间顺序和空间结构、主流体制和中介系统、“三元”构成及“历史化”的历史观等多个难点深入思考。如果说吴秀明的历史小说研究是“以史观文”,那么文学史研究则不妨说是“以文论史”。在这一辑里,窃以为有两点“先见之明”值得读者注意。

一是,学术转向的背后,作者回归学术的责任意识和反思文学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吴秀明在“自序”中称自己从历史小说研究到文学史研究的转向是对学术工作的一种“回归”。在2003年发表的《漫谈大学中文学科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一文中,他以纵深的历史眼光将现代大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相连通,强调高校中文学科教育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刻影响,独具慧眼地指出中文学科发展与当代文学前进的同一性和对话性,这意味着该研究阶段中的作者已对文学研究主体的职责有了清醒的认识。可作为参考的是2010年发表的《面对“丘陵”的忧思——关于当代文学学科的几点思考》,时隔7年后,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责任方之一——文学史的规范和确立,有了更为系统的阐释。“如果说作家作品(特别是经典或准经典的作家作品)可称之为支撑一个学科的阿基米德点的话;那么文学史则成为规范和确立一个学科地位的基础工程。”<sup>④</sup>作为文学研究的亲为者,吴秀明结合自身的高校教学经历和多年文学研究的体会,就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当代文学自身内部的关系问题、经典与通俗的关系问题、意识事实的关系问题这四方面有了研究主体性质的反思;此外,吴秀明发表于2014年的《当代文学史编写三个问题及相关选本的编选》对“文学史热”现象保持高度警惕,站在文学史主体的位置讨论文学史时段的长短、内容的繁简和主体的强弱问题,这对作者在第三阶段的文献史料研究中继承这一主体反思精神埋下伏笔。

二是,针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重写”“重评”“重排”事件的评判,作者具备的政治敏锐性和对“历史化”认知的思辨性。以《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和《后现代语境中的知识重构与学术转向——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谱系考察与视阈拓展》这两篇文章为例,吴秀明把如何看待政治、如何评价革命这两个敏感的话题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钩连,指出当代文学历史与中国革命历史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只有历史地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化,才有可能实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sup>⑤</sup>通过“历史化”的外源性理论与内源性思想剖析,他认为“重写”“重评”“重排”是在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对此前“历史化”的“再历史化”,是“未完成的历史化”。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它才有助于学人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学科化抱持辩证的态度:为避免正在“历史化”的当代文学走向“非人文化”,我们不应遗忘和忽略了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心灵史的考察。总而言之,吴秀明在当代文学学科发展视域下的文学史研究向历史充分“敞开”,在学科化、学理化的过程中又高度重视主体及其内在精神灵魂的勘探。这就使其对当代文学“历史化”的研究,不因其强调重要而走向偏至。

上编“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与“以史观文”的历史文学研究、“以文论史”的文学史研究不同,它重在强调作品与史料的互动,“文史互渗”,以达成作者前两个“学术根据地”建设向度的合谋。该编收录了吴秀明发表于2013—2017年的11篇学术论文,“史料”研究成为作者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心。文学文本、文学批评、文献史料、档案制度等多种研究层面在“文史互渗”的动态过程中彼此牵制影响,对单一视角下的当代文学研究无疑是打开了天花板,向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的成熟化、体系化研究靠拢。吴秀明认为,长期以来“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研究惯性造成了学术价值的损伤,也无益于当代文学学科走向成熟。从单一的批评化文学研究中走出来,把重视史料实证作为治学基础,能达到整体全局的“战略转移”。笔者认为,“文献史料研究”作为吴秀明“学术根据地”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直接决定了这一“学术根据地”的最终深度和广度。

首先,“学术根据地”建立与超越的动态平衡在于学术逻辑的前后一致性、学术思维的递进性和学者研究方法的进步性。文献史料研究对文学史研究的“再超越”是通过理论、批评和史料的打通,也即当代文学已有的理论批评体系的“历史化”。这与上文所述“历史化”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之说显然同源。自21世纪以来,吴秀明的学术重心向“文学与史料的互动”靠拢。早在2005年,他就在相关文章中初步思索了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问题,而作为历史小说领域重要的批评家,吴秀明的学术理论与实践本身就是研究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证人”。在《批评与史料如何互动》中,他吸收了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史料实证”“作品解读”和“理论思维”三要素组成文学研究主体的“正三角”(“△”)知识构架,“史料实证”与“作品解读”的双向互动共同支撑起“理论思维”。虽然强大的“一体化”体制使这个“正三角”构架如同戴着镣铐跳舞,然而史料与批评、历史逻辑与艺术逻辑互融互动,至少能稍稍纠偏过于主观化的文学研究趋势。正如他在《当代文学研究应该与如何“及物”》一文中所说的,当代文学与史料之间并不在于“去政治”或是“非政治”,而在于合历史、合逻辑地形成它们与研究主体的对话。同时,《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等文章依然延续了“学术根据地”建设第一、第二阶段对当代文学学科研究主体的反思,并

进一步通过学人的“代际”研究来说明,当代文学完全可以而且有必要承续中国传统的实证方法,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和创新性的发展。

其次,近年来高校对文学史料研究的重点支持也给予“学术根据地”不断超越其既定框架的可能性。从2010年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的立项开始,吴秀明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于2016年出版为65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直接引领了当代文学学术研究从基础设施到全局理论的深入和创新,<sup>⑤</sup>这对于当代文学学科内涵的挖掘与提升有丰富的启迪作用。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等作品选或史料选本的出版,则不断充实了吴秀明的文献史料研究成果,在深化史料意识、文史互动的同时,也实现了“学术根据地”的又一次超越。

最后,读者不能忽视的是,在当代文学已走过70年历史、而当下正倡导历史化、经典化的今天,“学术根据地”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个学人的坚守和奔跑。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发展至此,除了有吴秀明等“甘坐冷板凳”,倾力钻研史料的学科带头人勉之这种精神,也得益于他们将学术阵地的“后退”视为“前进”的战略目光。“学术根据地”没有恒定的发展模式,然而当代文学的研究者若要寻找自己的阿基米德点,构建新的“学术根据地”,还需潜心涵泳,不为纷乱的“学术热”丢失了深度钻研的热忱。

#### 注释:

①②④⑤ 吴秀明:《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吴秀明学术论文自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页、第515页、第357页、第329页。

③ 吴秀明:《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⑥ 杨洪承:《当代文学“历史化”命题与学科建设的自觉——兼谈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阅读印象》,《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

(陈璧君,女,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